



迟到的道歉

■梁发占

这虽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,可至今回想起来,心情总不能平静,遗憾的心结没有解开。我多想给我远方的战友、当年的排长武华北说:“排长,对不起!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、培养和期望。”如果他在我面前,我一定握住他的手,给他行个庄严的军礼。

我心里为什么会对接长有愧疚呢?情况是这样的。武华北是1965年入伍的,他来自山西太原,父母都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,当地政府民政武装等部门联合保送他入了伍。武华北同志的特长,就是用左手写字和绘画。他画的水彩画、水粉画、国画、油画在团里很有名气。当时我们1968年入伍的有不少文盲,相当一部分是高小毕业,初中毕业的则寥寥无几。我既是初中生又写得一手好字,时常替战友写家信、办连队的黑板报、写总结材料,在文差事方面常受到连领导的重用。当团里需要文艺方面的人才时,武华北就极力推荐我。我曾先后去团里参与制作毛主席纪念章,在营部制作幻灯片。后来团部又直接抽我去师部刻制毛主席诗词镜匾。共同的特长、爱好和兴趣,使我和武华北同志建立了情感,结下了兄弟般的情缘。

1970年底,我们部队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野营拉练。当时,武华北由班长提升为一排排长,而当时我班的班长又被团部借调搞宣传去了。一路上,在没有班长的情况下,我起到一个老兵的带头作用,积极配合代理班长工作,勇于吃苦,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。于是,武排长就多次给我做思想工作,让我不要考虑退伍的事,并诚意地许诺我,先给我解决组织问题,并让我担任二班班长。

1971年3月份,我们同一批入伍的战士,要有一半人员退伍。我就向通讯员打听我退伍的消息,通讯员说,连里没定让我回去,排长又向连长、指导员反映过,坚持让我留下。我怕退不了伍,就让通讯员向连领导转告我的想法。当连长指导员找我谈话时,问我有几手准备,我说只有回家一个准备,并一连串地说出了爷奶年纪大、父亲不在家、姐妹多、家庭缺劳力、生活有困难等几个要一定回家的理由。连领导听后,给我做思想工作,劝慰我说:“家庭有困难,有地方政府哩!再说,排长一定要把你留下来,作为党员培养对象,让你尽快加入组织,给你安排个班长职务。”一番交谈后,连领导看我要退伍的思想坚决,最后也只好同意了我的要求。

两天后,武排长得知了这一情况,找我谈心,我便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,一时间,排长很难接受我的决定,气得直拍桌子直跺脚,严厉地埋怨我:“一路上,我咋给你做的工作,我的话一句你都没能听进去吗?你怎么不理解呢?你真让我失望啊!”听了排长的一番略带责备的肺腑之言,我无言以对,低着头默默无语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让我遗憾和懊悔,我对不起排长的良苦用心,无法报答排长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。



我的母亲

■邓秀兰

尽管母亲已谢世十余载,但我仍不能忘怀,在母亲节来临之际,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。

母亲鲁贤宾,项城人,生于1907年(光绪三十三年),故于2003年,享年96岁,寿终正寝。

母亲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时空,经历了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,亲历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,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我们的国土。国破山河在,抗击侵略者的号角唤起了所有爱国的热血青年,唤起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,唤起了各界爱国人士,同时也唤起了我的母亲。母亲出身书香门第,大家闺秀,外公鲁明善曾任县令,爱国将领吉鸿昌的把兄弟,他办学

堂,建学校,母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,受到女性新思潮的影响,爱国家,爱人民。因而,抗日战争爆发后,母亲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她的陪嫁,包括武汉的鲁公馆和两个商铺,全部捐献支援抗日战争。后来又卖掉了项城老家一部分田地,而且还把所有的金、银、珠宝首饰,以及文房四宝等打包放到马背上,亲自交给了当时的闻县长,支援解放战争。我家经常有解放军官兵来养伤,母亲都是悉心照顾。

尽管如此,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,我家仍有800亩地,所以划成了地主成分,但没给母亲戴地主分子帽子,按公民对待,发了选民证,母亲很欣慰。土改工作组还给我家留有60亩地。由于父亲邓盛轩随解放大军南下,长兄邓彤云大学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文化教官,所以政府批有土地代耕款,每亩地每年15万元(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),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。母亲把这些钱通过农会分给了种地的几家农户,地里的收入除向国家缴纳公粮外,也归他们所有。母亲说,若代耕款我们领,地里的收入再分成,那我们不是又成地主了吗!

母亲只种离家最近的2亩多好地。尽管母亲前半生没有种过地,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,但她掂起三寸金莲,每天鸡鸣而作,日落而息,把2亩多地料理得井井有条,早涝保收,区里还组织向她学习呢!2亩地的收成虽不够全家生活费用,但还有其他收入。母亲心灵手巧,会做一些时髦的针线活,如军大衣、八角帽等,也是一笔小收入,另外我上学每学期还有8至10元的军属照顾款。记得1953年春天,青黄不接,政府通过学校转发给我8万元的军属照顾款,母亲一下就置300斤高粱,足够我们吃几个月的了。但由于那年夏天发大水,秋季大部分庄稼没有收成,有几家已揭不开锅,母亲还是给他们各送去了一点。

母亲的一生,可以说是拥有“五福”,即: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长寿、善终。母亲不但曾拥有过万贯家产,而且母亲的精神世界更丰富

多彩,母亲的阅历和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。新中国成立前昔,母亲还收到过宋庆龄主席的亲笔信,赞扬母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,可惜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,加之特务的搜查,母亲没能把信保存下来,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。

对佃户对佣人,母亲都是平等相处,关怀备至,谁有困难,尽己所能去解决。母亲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女性,开明、豁达、乐观,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,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,多么恶劣的环境,她总是说:车到山前必有路,夜再长恶梦总是会醒的,天终会要明的,狂风暴雨终会停的。实践证明在她的人生历程中,很多事都是有惊无险,都能逢凶化吉,人们都说我母亲是个富贵的老太太。

母亲年轻时,不怕牺牲,不畏艰难,舍小家顾国家,到处奔波为革命筹集资金,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一些富豪绅士家中,宣传爱国精神,筹措资金,支援革命事业。母亲老了,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生活简单朴实,心态平和,对现实生活很满足。她常说:现在的日子多好啊,没有战争,没有土匪骚扰,国家安定,社会和谐,人民安居乐业,种地不纳粮,上学不交费,这样的太平盛世,是有史以来没有的啊!

母亲的一生充满爱,乐善好施,受人尊敬,母亲的晚年很幸福,儿孙绕膝,从没患过大病,身体清瘦,精神矍铄,头脑清醒,语言清晰。临终前她还安排她的儿媳:幼儿园的来接送孙子,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上车,以免小孩被拐卖……这是母亲的最后遗言。母亲无疾而终,是她善良好德的造化。

